

韓

愈

(西元七六八—西元八二四)

程 運

「文人之雄」、理學的先驅者



我國史學家錢穆先生在所著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」中，曾特別指出：研究近代學術，必須從宋代開始；研究宋學，則必須從唐代開始，從研究唐代韓愈的思想開始。他說：「唐之學者，治詩賦，取進士第，得高官，卑者漁獵富貴，上者建樹功名，是謂入世之士。其遯跡山林，棲心玄寂，求神仙，溺虛無，歸依釋老，則為出世之士。亦有既獲廩仕，得厚祿美名，轉而求禪問道於草澤枯槁之間者。亦有以終南為捷徑，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闕者。獨昌黎韓氏，進不願為富貴功名，退不願為神仙虛無，而昌言乎古之道曰：『為古之文者，必志乎古之道。』而樂以師道自尊，此皆宋學精神也。」

。治宋學者首昌黎，則可不昧乎其所入矣。」

我們知道宋代理學之昌盛，可以說是衰落已久的儒學之復興；而儒學之復興，則在唐代已見萌芽

。近人胡適之先生嘗以宋儒的「新孔學」，克服佛教束縛，為中國文藝復興的起點。而真可稱為宋儒「新孔學」亦即理學的先驅者，當推韓愈。

宋代的學者文人，幾乎異口同聲，對「文人之雄」的韓愈表示一致的推崇。如宋代的理學家石介就曾說：「孔子為聖人之至，韓吏部為賢人之至。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，不知更幾千百年復有吏部。孔子之易、春秋、聖人以來未有也。吏部原道、原人、原毀、佛骨表，自諸子以來未有也。嗚呼，至矣。」（徂徠集尊韓）又如宋代的蘇軾，平生自視頗高，但在其所作「潮州韓文公廟碑」中，獨推尊韓愈「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」。並指出從東漢以來，聖道淪喪，文風敗壞，佛老的邪說都流行起來。雖經唐朝貞觀、開元的盛世，有房玄齡、杜如晦、姚崇、宋璟等名臣的輔佐，也不能挽救；惟獨平民出身的韓文公，在談笑裡領導了大眾，天下的人就跟隨了他，重歸正路，到現在已經三百年了。他的文章，振起八代衰頹的文風；他的道理，拯救了天下人的沉溺；他的忠心，不怕觸怒皇帝；他的勇氣，能制伏三軍的統帥。這難道不就是能參與天地造化，關係天下盛衰機運，表現了浩然正氣嗎？對韓愈真是推崇備至。再由於當時在政治上學術上都具有崇高地位的歐陽修出來鼓吹，尹師魯、梅堯臣、王安石、曾鞏等的推動，韓文遂大行於世，達到「天下學者非韓不學」的盛況。從宋儒的著作中，我們到處可以看到韓愈對他們的重要影響。正如新唐書「韓愈傳」中所說：學者敬仰他，好像群山仰望泰山，眾星圍繞北斗星一樣。（參見新唐書卷一七六列傳第一〇一）

淒涼孤苦、顛沛流離

韓愈字退之，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（西元七六八），他的原籍是河內修武（即今河南南陽縣），先世曾居昌黎，所以也自稱昌黎人。三歲就父母雙亡，依靠著哥哥及嫂嫂鄭氏撫養。七歲就知道努力學問，出口便成文章。十一歲時，他哥哥因為宰相元載得罪了朝廷，受到連累，貶官嶺南。他跟著哥哥嫂嫂遷徙到南方。十五歲時，他的哥哥死在韶州刺史任內，韓愈跟著嫂嫂，帶著哥哥的靈柩，萬里奔波，歸葬中原。又值中原多事，兵慌馬亂，全家又遷居到宣州（即今安徽宣城）。命途坎坷，歷盡艱苦，一直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。

韓愈有三個哥哥，都不幸很早就死去；承接先人血脈的只有韓愈和他的侄兒十二郎。「兩世一身，形單影隻」（韓昌黎全集第二十二卷），淒涼孤苦的身世，顛沛流離的環境，更激發他刻苦自修、好學不倦的毅力。終於讀通了六經及諸子百家之學。

焚膏繼晷、兀兀窮年

韓愈曾在「進學解」一文中，借學生的口氣說出他在治學方面所下的工夫。說他嘴裡不停地念著六經的文章，手裡不住地翻閱著諸子百家的書籍；記事的書一定要抓住綱要，言論的書一定要探求深意。「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」，是說他學不厭；「焚膏油以繼晷，恆兀兀以窮年」（見全集第十二

卷），是說他非但白天苦讀，夜裡還要點油燈繼續用功，積年累月、努力不懈。

他在「答李翊書」中勉勵他在治學作文上下工夫，希望他能達到古人立言境地，不要企望趕快成功，不要為權勢利祿所誘惑。要像種植果樹，施肥養根，等待它結果；像點油燈，加上油，期望它發光。他說樹根深厚的，果實一定豐美；燈油充足的，發光一定明亮。仁義的人，言論必定溫和淳厚。

他謙稱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工夫到家了沒有，不過他總算孜孜不倦的已埋頭學習了二十多年。當初，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」，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」（見全集第十六卷），在家忘掉一切，出外忘掉道路，專心苦讀思索，寢饋於古代的典籍之中。當搜索心思拿筆寫文章的時候，只求盡力躲開陳陳相因的濫調，開始時真是很吃力，很難做到；在寫出來給人看的時候，常常受到別人的譏笑，卻不知道這是譏笑。這樣經過好些年，仍然不改變初衷，然後認識了古書裡的正道與邪說，和那雖屬正道但不純粹的，都像黑白兩種顏色那樣明顯易分了。再盡力剔除不純粹的，慢慢就更有所得了。於是他搜索心思拿筆寫文章，文思就像水流般湧出來了。寫出來給人看，有人鄙笑他，他就很高興；讚美他，反而使他憂慮，因為他擔心文章裡還有迎合流俗討人喜歡的地方。這樣又經過好些年，然後下筆如江河流水般滔滔奔放了。他又恐怕還有駁雜的地方，再就勃發的文思，排除其不合於道的，平心靜氣地去考察，直到完全純粹了，然後充分發揮。還要在道德學識上有所涵養：立身行道方面，要走仁義的路；讀書明理方面，要從六經中探索其來源；並且要終身努力，在治學作文上用深厚工夫，才能有所成就。

韓愈的文章議論嚴正，規模宏大。邵博在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四中指出：「韓退之之文自經中來。」方東樹在昭昧詹言中也說：「文字要奇偉，有精采，有英氣、奇氣……但奇偉出之自然乃妙：此存乎其人，讀書深，志氣偉耳。若專學詩文，不去讀聖賢書，培養本源，終費力不長進。如韓公便是百世師。」這就是韓愈自己所講的「閱其中而肆其外」（語見進學解）「行之乎仁義之途，遊之乎詩書之源」（語見答李翊書）的意思。

操行堅正、鯁言無所忌

韓愈因為讀書多，所以見事多，理足而識見有主，下筆為文，遂能淺深反正，四通八達。韓愈為學作文，更注重養氣：胸懷浩然，則能行乎其不得不行，言乎其不得不言，言行完全出乎真誠。不徒托之以空言，且能見之於行事。持身立朝，乃能表現高風亮節，直言敢諫。新唐書本傳說他「操行堅正，鯁言無所忌」。人家講他的壞話，毀謗他，也不懼怕，好幾次得罪了執政，觸怒了皇帝，被貶官、被放逐，到蠻荒遠地亦不懊悔。韓愈就是這種不僅能知「道」，而且真能切實行「道」的人。

唐德宗貞元八年（西元七九二），韓愈考取了進士，時年二十五歲。因為生性耿直，不善奔競，直到三十一歲才得到入仕的機會。在做監察御史、職方員外郎、中書舍人的時候，前後三次貶官，都是因為上疏奏陳政事，與朝廷議論不合而獲罪。在憲宗朝，上表論佛骨，出言亢直，氣勢磅礴，忘一己之利害，置生死於度外，義之所在，則強立而不同，這是因為他平日集義養氣，所蓄深厚，才能達

到此一境地。

韓愈在「答李翊書」中又說：氣像水，言論就像漂在水上的東西。水大了，那麼能漂的東西不論大小都會漂了起來。氣和言論的關係也是這樣：氣要是盛，那麼言論不論長短，聲音不論高低，都會恰當。雖是這樣，他自己還不敢說已接近圓滿成功的地步；即使接近成功，為人所用，又有什麼可取的地方呢？不過，希求別人拔用，則必須迎合人的喜惡，自己好像是被動的器物，用與不用，完全操在別人手裡。君子卻不是這樣，君子居心有一定道理，行為有一定規矩；用他，就把大道行於世人；不用他，就把道傳給學生，或著書立說，留為後人的模範。韓愈指出：當世學古文的人很少；立志學古文，就必被遺棄於今世。他真喜歡這種人的志願，而悲哀這種人的遭遇。他所以常稱讚這種人，是勸勉他、鼓勵他的意思。（參見答李翊書）

韓愈在另一篇文章「進學解」中指出，從前孟軻長於雄辯，孔子的道因此昌明，可是他遊遍天下，奔走到老也沒有人用他。荀卿守著正道，發揮偉大的議論，為了逃避讒言到楚國去，最後丟了官死在蘭陵。這兩位大儒，說出話來就是經典，一舉一動都可以讓人效法，且超過常人，達到聖人的境界，可是他們一生的遭遇卻是如此。

上面韓愈所說的「言」與「文」，實在就是「道」，就是「理」。理直則氣壯，道盛則氣盛，氣盛則文昌。立志學「文」的人，也就是立志行「道」的人，這種人既不肯少貶其道以迎合時俗，更不肯自毀其道以盲從邪說。這種人服官受到貶黜，被投閒置散，原是本份，是理所當然的。所以韓愈能

夠屢挫不屈，不怨不悔。

特立獨行、舉世非之而不惑

韓愈在伯夷頌中曾說：「士之特立獨行，適於義而已，不顧人之是非，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。一家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寡矣；至於一國一州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蓋天下一人而已矣；若至於舉世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。若伯夷者，窮天地、亙萬世而不顧者也。」把伯夷推尊到比「作為萬世標準的聖人」更上一等，真可說是「推崇備至」的了。曾國藩在求闕齋讀書錄中指出：「舉世非之而不惑，此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之宗旨，此自況之文也。」這實在是真正了解韓愈志節與文章的人所講的話。

在韓愈以前一般人所寫的文體，大都注重辭賦及駢體文，文體呆板，多拘偶對，使作者的思想受到束縛，而且文格綺豔，陳陳相因。韓愈起來倡為「古文」，解除束縛，恢復自由，改極呆板的駢文，為較活潑的散文，表面看來是「復古」，實際是一種「革命」。由於韓愈不願迎合流俗，所以受盡別人的非笑。韓愈認為作文「若與世沈浮，不自樹立，雖不為當時所怪，亦必無後世之傳」（見答劉正夫書）。故豪傑非常之士，「信道篤而自知明」（見伯夷頌），不肯隨俗浮沈，以邀一時之譽。寧願寂寞當時，但求流名於後世。

韓愈雖好讀古書，學古人，但不為古書所迷，更不讓古人牽著他的鼻子走。能「卓然不丐於古而

一出諸己」（宋景文語），能盡力躲開陳陳相因的濫調，能溫故而知新，更能融古而創新。他諫佛骨之對人主的忠心，是人臣中少有的；他趨賊營宣撫王廷湊的勇敢，也是同僚中少有的。他講一般人所不敢講的話，作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事，特立獨行，信道守道，確已達到「舉世非之而不惑」的境地。

以道弘文、以文貴道

韓愈在所著「原道」一文中指出：博愛叫做仁；做事合宜叫做義；照著仁義做叫做道；修養自己的天性圓滿，無求於人叫做德。他又指出：他所講的道德，是合仁義來一起說的。也可以說韓愈所言之道，是仁義，是修己以安百姓，是不離乎人倫日用之間的。進一步講：韓愈所講的道，就修養說，則是正心誠意，以至修齊治平；就人生說，則是綱紀倫常，養生送死；就政治說，則是禮樂刑政，風俗教化；這就是孔子所講「道不遠人」（中庸第十三章）的意思。

韓愈在「題歐陽生哀辭後」一文中曾說：「愈之為古文，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，思古人而不得見，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。通其辭者，本志乎古道者也。」（全集二十二卷）韓愈的意思是說：他是因為好古道而為古文，並不是為古文而後好古道。這乃是「以道弘文」的意思；也就是「誠於中則形於外」，道盛則氣盛，氣盛則文昌的意思。

韓愈的女婿李漢，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說：「文者，貫道之器也，不深於斯道，有至焉者不也。」這不僅是說文章的好壞與入道的深淺有密切的關係，而是說「文」與「道」是一以貫之的東西。說「

以文貫道」，與「以文明道」，及「以文載道」，有極大的距離。「以文明道」是說文章可以明道教人，可以記事傳世，是發揚道德的工具；文章的醇駁，看它見道的多少而有差別。「以文載道」則其境界較「以文明道」更深一層，是說文章要能直趨聖人之大道，能窺大道之全，乃可以言「載道」。「以文貫道」則又深一層，是說文道一貫，文以道為內容，道以文為形式，二者已發生不可分的關係，再進一步就可漸漸達到「文道合一」的境地。

古時候的聖人，能體道於身。道充於中，事觸於外，形乎言而成文。宣之於文，發之於功名事業，無非為其道之外見。故其文即道，其道即文。韓愈一生學道好文，二者兼營：「行之乎仁義之途」，「游之乎詩書之源」，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；其立身行事，出處進退，又能一合乎道；文以行立，行以文傳。所以宋朝的歐陽修說：「昔孔、孟惶惶於一時，而師法於千萬世；韓氏之文，沒而不見者二百年，而後大施於今，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；蓋其久而愈明，不可磨滅，雖蔽於暫，終耀於無窮者，其道當然也。」（記舊本韓文後）

以師自任、以道自任

韓愈作「師說」一篇，一開始即說：古代求學問的人一定有老師，老師是傳道、授業、解惑的人；人不是生來就知道一切道理的，誰能沒有疑惑呢？有疑問不去跟老師學習，他的疑問就永遠不能解決了。

韓愈認為：比他年歲大的，理解道比他早，他就跟著學；比他年歲小的，如果理解道也比他早，他也跟著學。他師法的是道，那裡管年歲比他大還是小呢？所以不管是富貴還是貧賤，是年長還是年幼，道在那裡，老師也就在那裡。

韓愈接著指出：由於師道之不傳，所以人多不學；一般人愛其子，故擇師而教之，可是臨到他自己卻見理不明，以找老師為可恥。韓愈又指出：巫醫百工不恥相師，可是士大夫求師，則群聚而非笑之；孔子大聖尚說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」（論語述而），而多方求師；士大夫不求師，則由於不知術業有專攻，不明見賢思齊的道理。

韓愈說：「師者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。」（見全集第十二卷師說）照曾國藩的解釋；傳道是傳修己治人仁義倫常之道，受業是受古文六藝之業，解惑即指解此二者之惑。教師的目的在明道、傳道，而道不外乎明五倫。師之名，雖不列於五倫之內，而五倫之名，實賴師以明。無師則亦無五倫，道不外乎明五倫，而五倫之外，別無所謂道，所以說「道之所存，即師之所存也」。

柳宗元在「答韋中立論師道書」中指出：孟子曾說過：「人的毛病，在喜歡做老師」。從魏晉以後，人更不重視老師。現代沒聽說有作老師的；有了，大家就譏笑他，以為是瘋子。只有韓愈奮然不顧時俗，冒著人家的譏笑侮辱，招收後進學者，發表「師說」，板著臉孔，要做老師。社會上果然有許多奇怪，手指目視，一起責罵他，把他作為談笑的資料。韓愈因此得了個「瘋子」的名號。

韓愈所以「召鬧取怒」，「抗顏而為師」，並不是他「好為人師」。他的「以師自任」，一方面

是他不願隨俗浮沈、迎合時下的風氣，而要移風易俗，行古道，「獨為所不為」；一方面是他「古道熱腸」，基於對青年後進的愛心與責任心之驅使，因此他要「以師自任」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」。所以韓愈「以師自任」的主旨，還是為了傳「道」。他在「師說」中所講「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」，仍是「聞道有先後」，「以道為主」的說法。

韓愈卒於唐穆宗長慶四年（西元八二四），享年五十七歲。韓愈的學生皇甫湜，在所作「韓文公墓誌銘」中，說他為人坦白明朗，胸無城府；宗族姻親朋友故舊不能自立的，穿衣吃飯嫁女娶妻治喪埋葬諸事，完全靠他幫忙。平日在家裡，就是睡覺吃飯也要帶著書，累了當做枕頭，吃飯用來提口味。講解論說，孜孜不倦，如此磨鍊學生，還恐怕不夠完美。又用幽默的笑話及吟咏詩歌的方式來舒暢精神，終要想盡方法，使學生陶醉在義理裡，忘了回去。

在韓愈侄女婿李翱所作韓公行狀中指出：韓愈幼年由嫂鄭夫人撫養長大，嫂死之後，他穿一年喪服，以報答她的撫育之恩。在他所作祭鄭夫人文及祭十二郎文中，我們可以在字裡行間體會到他的哀慟，體會到他對家人的深厚的感情。他待人誠懇，與人相交，始終不變；於後進則愛護備至，提拔有加，惟恐失其成就，這就是「修身以道」、「修道以仁」（中庸第二十章）。他所說的「道」，不僅表現在他的言論上、他的文章上，也表現在他的性情之中，表現在他的立身行事上。

韓愈在所作「原道」一文中指出：他所講的這個道，由唐堯傳給虞舜，虞舜傳給夏禹，夏禹傳給商湯，商湯傳給周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。周文王、武王、周公傳給孔子，孔子傳給孟軻；孟軻死了，就

沒有人得到真傳了。韓愈雖未明言「道統」由他而傳，而「以道自任」之意，則隱然可見。

文彥博、杜牧都說過：稱孔子之德，莫如孟子；稱孔子之尊，莫如韓愈。（參見樊川集及文潞公集絳州新修至聖文宣王廟碑記）我們假如說孔子之道，由孟子、韓愈之闡揚而益為昌明，則是毫無疑問的。孟子距楊、墨而道以之傳；韓愈排老、佛而道亦因文以見。自孟子以後，韓愈以前，雖不乏尊孔孟，或闡佛老者，但可以說，其影響的深遠和鉅大，沒有一個人可以比得上韓愈的。